

幻灭的“美国梦”

——一个教育人类学视角的解读

刘 谦¹ 李颺颺²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传统美国价值观念中,这是一块“充满机遇的土地”,每个人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在这里寻求“美国梦”,只靠自己就能够完成梦想。但美国女性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的力作《不平等的童年》,通过对9个不同性别、种族、阶层的孩子及其家庭进行深入观察与访谈,得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结论: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崇尚并实践着不同的教养模式。中产阶级倾向于“协作培养”式教养,而劳工阶层和贫困阶层的教养则以“成就自然成长”模式更为典型。在此,阶层的平等得以固化和再生产。本研究通过对此书问题意识和展开框架、基本概念和主要观点、作品风格特点等方面分析与讨论,借助美国场景,以教育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探讨教育中的阶层分化问题及其对中国情境的启示。

关键词: 《不平等的童年》;教育人类学;阶层

中图分类号: G40-0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6-0084-09

84

The Disillusioned “American Dream”: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Education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LIU Qian¹, LI Si-yang²

(1.2.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values, this is a “land of opportunities.” Each person relies on his own ability and efforts to seek an “American dream” on this land, and he can complete his dreams on his own. However, the American female sociologist Annette Lareau’s masterpiece “Unequal Childhood” provided a strong conclusion through in-depth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with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of 9 different genders, races, and classes: Different classes of American society advocate and practice different modes of parenting. The middle class prefer “concerted cultivation”, while the labor class and the poor families are more typical of the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model. Among them, class inequality is solidified and reproduced. Through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perspective of consciousness of question, development framework, basic concepts, main points of view, and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Chinese society and education further by rethink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the US scene.

Key words “Unequal Childhood”;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lass

收稿日期:2019-08-0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飞地’现象: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京就读中职学校路径的社会学研究”(17SRB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谦(1972-),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论;李颺颺(1996-),女,安徽宣城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在美国文化中,“美国梦”的叙事创造了一种个人主义的行动图式,即个人的成败系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努力之上,而社会仿佛只是一个提供平等机遇的舞台,任人发挥。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所撰写的《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一书,却在这片被誉为“充满机遇的土地”(land of opportunity)^[13]上,旗帜鲜明地挑战了“美国梦”的神话。它明确揭示出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家庭所采取的不同教养模式,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社会阶层不平等及其固化方式的重新认识。这项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的研究始于1989年,作者拉鲁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中取样了88个9至12岁的四年级孩子^[13],从中挑选了12个阶层、种族、性别不同的孩子,对他们及其各自的家庭、学校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访谈,在对调研资料进行详细的整理和分析后,拉鲁以生动的叙述、清晰的框架,重点呈现了其中9个孩子的家庭景观和培养模式,得出了极具说服力的结论:美国中产阶级倾向于“协作培养”式教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而劳工阶层和贫困阶层的教养模式则以“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更为典型,这是美国社会阶层不平等在教育与文化遗产领域的表现。

此书2003年一经推出,在社会学专业领域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于2004年先后获得AESA Critics Choice奖、美国社会学协会社会问题研究分会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Prize),得到《美国社会学杂志》《哈佛教育评论》等期刊的广泛好评^[2]。2011年,在对12个家庭进行持续追踪的基础上作者又推出了第二版。第二版中展现了一些对于第一版作品的评论,其中艾米·蒂德曼(Amy M. Tiedemann)评论道“通过每一个个案研究的充实的案例,这本书有力地解释了阶层之间不同的教养价值和实践……可以作为关于深度定性研究优点和困境的丰富讨论的奠基。”^[3]我国则在2010年和2018年先后推出两个版本的中文译本^[4],其中张旭等译者的翻译较好地体现了原著的核心思想和作品风格。

笔者将这部教育社会学著作作为教育人类学基本文献进行引介,基于三点考虑:一是社会阶层与教育实践的互动议题以及对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反思,是教育人类学的重要议题之一;二是在回应这一议题时,引述非常典型的民族志素材作为核心证据支撑并从方法论角度不断叩问主位与客位、自然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关系及其平衡,具有深切的人类学意味与关怀;三是它清晰有力的呈现方式也值得教育人类学学人认真揣摩,有利于促进中国教育人类学推出更具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因此笔者对此书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评述,并通过一定篇幅的原文引用来体现作品的文本特点和语言风格,以期更好地领略这部思想性与文学性兼具的学术著作的独特意味。

一、作者简介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的作者安妮特·拉鲁于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1974年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8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南伊利诺伊斯大学、天普大学、马里兰大学,2008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任职。

她的研究集中于从家庭领域对教育实践进行的观察和反思。她感兴趣于孩子及其家长的社会地位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先后出版了《家庭优势》(1989)、《不平等的童年》(2003)、《家庭选择和学校选择》(2014)等多部著作,关注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家庭如何选择住址和学校等问题。除前文所述奖项,她还凭借《家庭优势》一书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 Willard Waller

奖项和1991年的 AESA Critics Choice 奖项。现阶段她正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进行一项关于70个家庭的质性研究,考察“富二代”和“富一代”之间面临的祈愿和挑战的差异^[5]。

二、写作背景与问题意识

忽略一部著作的背景就无法对其进行深入了解。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看这部著作,或许难以理解为何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观念里,阶层分化和再生产古已有之,如同俗谚所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但美国社会却并非如此。这本书的主要受众是美国读者,作者想要对话的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的“美国梦”的个人主义叙事。作者在第一章交代了相关背景:

与承认社会地位的力量相比,美国人能更轻松地承认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研究表明,美国人大都相信它们的成就来自于他们的个人努力。只有少数五分之一的人看到“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或阶级地位”对在生活中获得成功是极其重要的。……^{[1]7-8}

作者对那些认为社会内部差异具有分级渐进的渐变等级的理论进行了反驳,这些理论认为:在当代美国社会中不存在一种明确分类的社会阶层或等级,而是根据受教育程度、收入差异、职位差异、声望差异等要素存在一个分级渐进的体系,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存在彻底的“类”的差异。作者明确表述“我认为类别分析等方法更有价值——可以用类析法把各个家庭按照贫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类别分组。”^{[1]235}这里已然暗含着布迪厄的文化区隔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对话。但是,作者“为了让这本书更容易读懂”^{[1]271},并没有在正文中将这一对话作为显性内容进行讨论,而是在正文之后单辟出“附录二理论:理解布迪厄的著作”进行回应。作者在布迪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关系如何在与具体公共机构的交锋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文化资本是如何产生教育利润的?

86

三、作品核心内容

该部分将从三方面来呈现:一是全书的写作框架;二是框架之内作品对核心概念的界定、论证过程和典型案例引用;三是对本书研究过程及方法的介绍。

(一) 全书框架

在明晰问题意识之后,我们将目光集中在书的主干框架。该书有十四章,其中第一、二章讲述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核心概念——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第三至第十一章是民族志细节呈现最为充分的。它分三部分共九个章节,分别对9个个案进行了深描,用不同个案的不同侧面比较分析了两种不同培养方式的三个核心要素:(1)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2)教育中如何运用语言;(3)家庭与教育机构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培养方式的三个核心要素方面,不同社会阶层呈现不同的模式特征。第十二章是整本书的总结和理论讨论,对案例呈现出的趋势进行总结分析,再一次强调社会阶层视角的站位以及对第一、二章提出的关键概念进行回顾与强化。全书框架简明,逻辑清晰,分析有力,体现出作者深入的思考和对文本极强的驾驭能力。笔者梳理了这9个案例的孩子在阶层、种族和性别上的分布情况和每一章讨论的主题及结论(见表1)。

表1 《不平等的童年》9个案例孩子的阶层、种族、性别分布和讨论主题及结论

		姓名	阶层	种族	性别	讨论主题及结论
第一部分	第三章	加勒特·塔林格	中产阶级	白人	男性	如何组织生活:精心安排
	第四章	泰雷克·泰勒	工人阶级	黑人	男性	如何组织生活:自由发挥
	第五章	卡蒂·布林德尔	贫困家庭	白人	女性	如何组织生活:自由发挥
第二部分	第六章	亚历山大·威廉斯	中产阶级	黑人	男性	如何运用语言:讲道理/语言训练
	第七章	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贫困家庭	黑人	男性	如何运用语言:发指令/简短朴素
第三部分	第八章	斯泰西·马歇尔	中产阶级	黑人	女性	如何面对机构:干预/批评
	第九章	梅勒妮·汉德隆	中产阶级	白人	女性	如何面对机构:干预/批评
	第十章	温迪·德赖弗	工人阶级	白人	女性	如何面对机构:依赖/挫败/冲突
	第十一章	小比利·扬内利	工人阶级	白人	男性	如何面对机构:依赖/挫败/冲突

(二) 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提出了两个概念:协作培养与成就自然成长,对于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理解是解读本文的关键。作者给出了“协作培养”的含义:

黑人和白人中产阶级父母都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在这些家庭里,家长对孩子的天赋、见地和技能进行积极培养和评估。他们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他们跟孩子讲道理。他们盘旋在孩子周围,并且在外面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孩子而干预各种事务^{[1]237}。

“成就自然成长”则指:

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发展应当是自然展开的,只要给他们提供抚慰、食物和其他基本抚养条件就可以了。我把这种教养儿童的文化逻辑称作成就自然成长^{[1]237}。

拉鲁强调美国的现代社会中存在明确的阶级划分,而不是渐进的分层顺序。她认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贫困家庭之间在教养方式上有着本质的结构性差别。这两种培养方式的差别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得到体现:(1)孩子空闲时间的安排方式;(2)如何使用并训练语言方式;(3)家长与学校等权威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进行研究之前,作者原本预设工人阶级家长和贫困阶层家长之间也会出现显著区别,但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并不是这样,这一点更坚定了她对于这种明确阶层分类而非渐进区别之间的信念。

首先,在孩子空闲时间的安排上,协作培养策略强调安排孩子参与有组织的同龄人课外活动,包括体育或艺术类的活动。其优点在于让孩子在众多活动安排中学会区分轻重缓急,自主安排时间;同时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学会与成人交流,掌握一些中产阶级白领工作中必要的组织和沟通等技能。缺点则在于整个家庭都忙于孩子的活动,对于一些父母来说太过于力不从心——不仅要保证对孩子活动的参与度,还要接送孩子往来,以致于家庭相处的时间也相对有限;同时孩子在没有安排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无聊。比如说加勒特·塔林格,一个白人中产男孩,因为比较喜爱运动,他的课余时间就被不同的足球训练、篮球训练和比赛等占满了,家中的日程表几乎没有空余时间:

大儿子的日程安排决定了全家的步调。塔林格夫妇常常只有很有限的时间奔波于工作和孩子的活动之间。……他的活动也就决定了家长什么时候必须要在什么地点……每个人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饭。……加勒特五月份……要参加棒球、森林足球队、州级足球、游泳队的训练、钢琴课和萨克斯练习^{[1]41}。

对于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家庭而言,父母由于经济压力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赚钱养家,

不会管理和组织他们的课余时间。于是孩子们往往就近与邻里间年龄不一的孩子在一起自行安排游戏。这种游戏方式往往更快乐,更具有童真的创造性,但他们没有经过有组织的训练,与成年人交往的时间也比较少,这使得他们将孩子与成人的世界明确地划分开来,受到成人的关注很少。如作者的观察,在贫困阶层女孩卡蒂·布林德尔的家里,她同伙伴在家里四处找人陪她们一起玩戏剧表演,家长们却统统无视,认为这是孩子无关紧要的事情:

卡蒂第三次要求被‘击毙’时,阿婆看起来已经很烦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也没有再提出同样的要求;……她们到厨房去筹划一个圣诞节的小品,然后到客厅来表演。……在阿婆家,这些小品却无一例外地被成年人所忽略^{[1]98}。

他们认为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就足以充分体现关爱,不需要刻意干预孩子的课外活动。这种对于课余时间安排方式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孩子们与亲戚和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差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与亲戚之间相对比较疏远,在同一个核心家庭内部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则倾向于竞争。因为父母的时间和资源都有限,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获得更多的关注非常重要。但在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家庭,家长需要经常与亲戚相互帮助,因此与他们关系密切,“大家庭”的观念很重。同时,因为孩子与大人的世界有明确的分隔,兄弟姐妹之间身处同一个世界,感情联系也更加亲密。

其次,在如何使用语言管理孩子的方面,协作培养逻辑同成就自然成长逻辑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前者提倡使用语言,与孩子进行相对平等的交流,培养孩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大量的谈话、争论,如果孩子可以说服大人,大人也不会强求。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培养了孩子利用语言交流的技巧向一些有权威的大人提出诉求,收获关注,并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诉求谋得成功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词汇量、语法、与人交流的态度和方式都得到了训练。比如说亚历山大,一个黑人中产男孩,在一次就医的过程中母亲教他怎么跟医生交流,怎么提出自己的诉求以获取关注,还有在交流的过程中注意眼神交流等技巧:

我们驶入帕克巷的时候,[威廉斯女士]低声对亚历克斯说“亚历山大,你得想想要问医生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都可以问他的。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亚历克斯想了一分钟,然后说:“我用了除臭剂之后腋下就出现了几个肿块。”妈妈说“真的吗?你是说用了新的除臭剂之后?”亚历克斯“是呀。”威廉斯女士“嗯,你应该问问医生。”^{[1]122}

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有时候孩子获得的权利过大,但又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完全掌控力,有时会利用这种方式来对付父母,使父母难以进行管理教育。

在成就自然成长逻辑里,对孩子的管理则体现为“令行禁止”,即父母发出号令,孩子就必须执行;父母禁止孩子做某件事,孩子就应该立即停止。父母不会有过多的解释,对比较淘气的孩子甚至会用体罚作为威胁方式,孩子也不多问,只是被动服从。

孩子们都是毫无意见地去做大人要他们做的事情。例如,一天晚饭时,哈罗德抱怨不爱吃菠菜后,他妈妈叫他还是要吃完:

妈妈(大声地)吼他,叫他吃菜“吃!把菠菜都吃光!”(没有回应,哈罗德在桌子边磨蹭着。)……他把菠菜吃掉了。他把芋头都剩下了^{[1]146}。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孩子相对比较好管教,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果敢自信远远大于被动服从

的国家,这些孩子面对权威时往往比较惶恐,没有充分的经验进行沟通,表达自身诉求,这对他们的学校生活和求职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贫困家庭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在这种培养方式中形成了两种性格:面对父母师长和权威人物时,总是被动服从,十分乖巧;在自己所处的小圈子里却极具领导能力。

种族因素在美国不能被忽视,因此作者特别关注了黑人中产家庭的父母和黑人工人阶级的父母怎样对孩子表述种族问题,发现他们也有很大的差别。去看医生的亚历山大,他的父亲一直在强调不能拿种族不平等作为自己不努力的借口,而母亲在面对看似是一种种族歧视的对待时,完全不把对方的态度归结于种族问题,而是照常去进行沟通和解决,从而孩子也不会被刻意强调这种因素的存在。他们在挑选孩子的学校和团体时也格外注意,防止孩子成为他所在群体里唯一的黑人孩子而遭受歧视。而工人阶层或贫困家庭的父母则通常会不断强调自己作为有色人种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强化孩子脑中的这种概念。

再次,与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也是两种不同培养逻辑的核心区分。中产阶级的家长会借助自己的人脉关系反复比较不同的教育机构,为孩子挑选更合适的。他们还会严密地监控和干预整个进程,一旦发现孩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会不断施加压力,使得校方满足自己的要求。中产阶级黑人女孩斯泰西·马歇尔想要学习体操,母亲替她挑了一所训练学校,但是她一开始跟不上老师的节奏,经常被老师批评。母亲去找老师,提出批评,认为老师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同时还不断去找学校,最终为孩子争取了一个适合她程度的班级:

她给县里的各种体操班打了很多电话,开车到两个班点去调查。参加了一个班的两次家长会……并给其中一个班的主管打电话提意见……很多时候,斯泰西都陪着妈妈去寻找合适的体操班。因此,她学到了需要用什么标准来评估一个体操班,还发展了一套用以表达自己观点的特定词汇^{[1]1753}。

但是对于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家长来说,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逻辑就是对权威人士表示尊重和被动服从。所以尽管他们会私下吐槽,但在面对教育机构时,还是以服从为主。他们认为教育是教育机构而不是家长的事情,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个性和勇敢的国家里,这种态度会被校方看不起。他们偶尔因涉及体罚的教育方式受到校方干预,导致他们对于教育机构产生了一方面顺从依赖、另一方面害怕无奈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被孩子们看到,又形成一种学习和再生产,使他们面对权威时也表现出这样的状态。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男孩扬内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扬内利女士在很多方面都是按照学校的标准去做的……然而有时候,两个家长也会蔑视学校的规章。扬内利女士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比较低……扬内利先生也有和她一样的挫败感……担心学校会向州政府告发她……虐待孩子,因为……她觉得“比利有时候……也需要挨一顿打”^{[1]225-229}。

综上所述,拉鲁区分了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两种培养逻辑。但教育机构和社会上大多数权威机构采取和赞同的是前者,因此两种培养逻辑下成长的孩子分别形成了优越感(sense of entitlement)和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中产阶级孩子由于同成人的不断交往,受到大量来自成人的关注,很小就开始学习和训练职场上的各种技能,从而形成了优越感,在求学和求职的过程中都更得心应手。但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孩子由于没能训练这些技能,以及对权威的畏惧和服从,在面对权威时局促不安,无法掌握和利用这些资源。

随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协作培养一定比成就自然成长更好吗?她明确给出了答案:并不

是。这两种培养逻辑各有优势和不足,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哪一种更好,只是在当下美国崇尚的价值观里,前者更适应在社会中的发展。但在本质上,这种不同只应是差异,而非不平等。同时作者为这种区分提供了历史性解释,即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日益标准化,各种儿童休闲、课外课程以市场化、项目化的方式繁荣提供着;公共机构需要以谈判说理的方式介入沟通;进入公共机构则需要好成绩和活动参与度作为敲门砖。这些共同塑造着中产阶级的儿童教养标准^{[1]245-246},中产阶级也往往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源、工作条件和教育背景支撑这样的教养方式。作者也留有余地地说,“个体在扮演起社会结构地位,上演人生种种结局的时候,是有‘相对自主性’的。”^{[1]246}最后作者将全书的理论对话指向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她认为布迪厄“没有对拥有资本和激活资本的区别给予足够的关注”,认为本书的贡献在于“展示了这些惯习又是如何在与具体公共机构的交锋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以及文化资本是如何(依其激活方式而)产生(或无法产生)教育利润的。”^{[1]272}

(三) 研究过程及方法

作者在第一章中的“调研本身”和附录一、三对本书的研究过程进行了专门而详细的交待。这也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和其之所以能够提供强大说服力的缘由。书中对选取的9个个案的“自然主义”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以及文本的案例分折所采用的深描和比较研究方法,都带有强烈的人类学性质与关怀,对于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来说可谓一个优秀的范本和可以进一步比较和分析的对象。

文中个案来自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其中,前者地处市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聚居区,离黑人聚居区约十分钟车程,这里黑人与白人孩子约各占一半;其社区交通不便,犯罪率较高。后者则完全不同,地处郊区,建筑多为单层,有漂亮的操场和草坪。学校所处社区为白人中产阶级社区,附近有大型商场,交通和治安状况都很好。

1993-1994年研究团队按照性别、种族、社会阶层的均匀分布,选定12个家庭进行深入观察,采取团队作业方式:分派研究助理进入不同家庭,进行观察、记录,伴随着团队培训、统合和分析在1995年夏天完成了数据收集工作。后期写作中,以其中9个孩子及其家庭为典型个案进行呈现。

作者自述采用“自然主义观察法”:

对于每一个家庭,我们通常是在一个月的期间内到他们家中及附近地区进行二十次访察……大多数访察都会持续三个小时……还在每个孩子家里都安排了一次过夜的访察^{[1]19}。

观察的过程中研究者尽量不参与,而是将自己定位为“家里的宠物狗”,以求尽可能地观察到最为真实的生活状态。一开始研究者的介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家庭生活的过程和状态,但随着与研究相处时间和次数的增加,被研究者开始逐渐忘记其存在从而表现得更加真实自然。

除观察以外,作者还采用了深度访谈的方式,主要访谈孩子的母亲、父亲和老师,以对其情况做更深入的了解。在第一次研究十年之后,拉鲁又对当年的每个孩子及其父母手足进行2个小时的追踪性访谈。其结果呈现在第二版中,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拉鲁及团队最初的理论模型和分析结论。

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研究过程有着内省式反思。在第一章便提出“恒久两难境地”^{[1]10-11},在附录一部分再一次提出“两难境地”^{[1]266}。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无论从种族、社会阶层上,一直存在着局内人与局外人互视所产生的张力;自然主义研究范式和研究者主体性体察与介入的平衡;乃至审稿人、读者出于各自经历背景,对理解文本产生的投射作用等。

四、作品特征与评价

通过两个核心概念和九个典型案例,《不平等的童年》一书通过“探讨家庭教育和学校文化一致性的关系,打开了阶层再生产的‘暗箱’”^[6]。它之所以成为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在教育人类学领域被视为典范,有赖于以下三个特征的支撑。

第一,以理性的学术关怀和解读照亮现实问题。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教育的本质是文化传承与濡染。它不仅限于校园围墙之内,而是弥散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形中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行动范式。家庭教养无疑是人性养成、技能训练的重要场所。从家庭角度理解教育,既触摸到文化传承中恒久的阵地,从人类学的角度讲,也契合了文化那份弥散、无声却有力的存在。这本书凝视着当代美国正在上演的一幕幕家庭场景:中产阶级为了赋予孩子主流社会的生活技能,全家协作,在精确而繁忙的时间表中,有着奔波的疲惫和殷殷期待;而劳工阶层、贫困阶层缺乏充沛的经济资源、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中产阶级的语言方式,让孩子在更自由的状态下度过童年,却也在简单单向的命令中,容易产生面对公共机构时的局促。作者敏锐地抓住人们深埋其间的日常生活,以社会阶层的视角剖析和解释,对美国意识形态中回荡的“美国梦”给以鲜明击打。“本书的最出彩之处,是对于中产阶级‘阶层优势’传递机制的深度描写。”^[7]它对那些日常场景“去熟悉化”的凝视,体现了人类学从文化理解社会生活的意趣,同时对繁杂的日常生活进行中观层面的概括与提升,提出两个脍炙人口的学术概念“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使美国当代社会的家庭教育场景以学术的方式被凝固、提取、讨论。这一选题本身既具有广泛跨文化交流的社会基础,又有明确的理论讨论空间。这也是它能够超越学术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理由。

第二,以严谨的方法夯实论据与论证。与其人类学意趣相一致,它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田野工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入生活细节收集数据。场景描述极具代入感:家长讲话的语气与用词、中产阶级家长镶嵌在职业进程中繁忙紧凑的时间表、贫困家庭清洗校服的时间与地点等。这些被一一记录和呈现的细节构成了日常生活强大的迫力,有助于理解特定教养行为的场域,成为有力论据。二是认真交待研究方法。作者对整个研究过程,个案的选择过程、研究者的角色、研究团队分工进行了细致报告。对于读者而言,也因知情而更可信。三是在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中,渗透着田野工作的经典困境。作者多次提到“两难境地”:比如一个白人研究者去研究黑人家庭,因跨越族群遭到质疑^{[1]10};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调研员,对中产阶级孩子表现出对家长权威的不尊重感到震惊。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调研员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看法^{[1]262}。这些困惑是典型的田野工作困惑:研究者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深入另外一个血肉之躯的日常烟火,却又要再走出来给以远观与评述。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介入是否具有合法性?如何处理主观认知的投射?这些深层的研究焦虑似乎只属于以深入日常生活为己任的田野工作方法。田野工作方法也因此在此解构与建构中显示着独特的说服力与真诚。

第三,以清新的文风和充分的细节有效传递信息。每个作者会有自己的叙述结构和文风,其本身没有优劣,但民族志作为通过文字实现对文化逻辑进行阐释与交流的文体,人们期待它能够以生动的笔调带领读者进入作者所述场景,引起生活经验层面的共鸣;同时又能够以冷静的笔触进行文化逻辑的解说,展现知性力量。本书将9个个案以故事的方式分为9个章节,在其中穿插引入中观层面的概念和框架,又另辟附录进行讨论,刻意避免艰涩术语影响正文叙述。整部作品文风清新易

读, 框架明确, 逻辑清晰, 兼顾叙事的生动、完整、理论总结的抽象与建构, 既不因追求所谓的“理论性”而牺牲民族志素材的鲜活, 也没有任由民族志素材的庞杂霸占文本篇幅, 这有赖于作者对民族志素材精心的把控和对文本优秀的驾驭能力, 值得教育人类学著作者借鉴学习。也正因为这一文风, 该作品不仅在学术圈内部引起极大的反响, 也渗透到非学术读者群体, 在整个美国社会形成热潮。

毫无疑问, 《不平等的童年》这部经典的教育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在选题、研究方法、理论梳理、文本策划上具有宝贵价值。反观中国场景也似曾相识“起跑线”上的焦虑、高考状元对家庭优势的自觉^[8]。这种跨文化的共识和体验恰恰说明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抽象水准和强大解释力, 也说明本书虽出自美国场景, 但对理论的阐释具有相当的精准力度。同时不可否认, 在中国传统蕴含着跨越阶层的师道尊崇, 社会阶层的划分也因幅员辽阔、环境多元而更具复杂性。《不平等的童年》依托美国场景对不同社会阶层教养模式的总结, 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之处。比如, 无论是中产阶级向下流动, 还是寒门子弟向上流动, 这样古往今来反复出现的社会事实尚未从理论层面得到解说。

另外, 作者选取的样本都是寻求在社会流动中向上发展的家庭, 将其视为一个前提。但正如 Alice Goffman 撰写的 *On the Run*^[9] 一书中所描述的, 费城的一部分黑人团体很清楚想要过正常的生活极为艰辛和困难, 他们实际上也属于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孩子, 也应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 作者认为两种教养模式只是差异而非不平等, 那对它们优缺点的分析和评判又是基于什么标准呢? 是站在何种立场上, 以何种文化为背景进行判断的? 两种培养逻辑和主流社会生成培养要求之间的互构机理又是如何?

但无论如何,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提供了美国场景下思考代际阶层固化的模型, 我们可以借鉴其有力的研究、思考、写作方式, 反思自己的社会, 得出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安妮特·拉鲁. 不平等的童年[M]. 张旭,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 张建国. 家庭教养的逻辑与《不平等的童年》[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79-85.
- [3] Annette Lareau. *Unequal childhood: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4] 安妮特·拉鲁.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M]. 宋爽, 张旭,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5]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员简介. 安妮特·拉鲁[EB/OL]. [2019-07-19]. http://sociology.sas.upenn.edu/annette_lareau
- [6] 安超, 康永久. “文化区隔”和底层教育的污名化[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48-57.
- [7] 肖索未. 社会阶层与童年的建构——从《不平等的童年》看民族志在儿童研究中的运用[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1(3): 36-38.
- [8] 搜狐教育. 2018 高考状元大部分出自富裕家庭, 寒门出贵子已成为过去式[EB/OL]. (2018-06-29) [2019-07-19]. http://www.sohu.com/a/238395889_477923
- [9] Alice Goffman.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M]. Picad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责任编辑 谭琳妃 英文审校 孟俊一